本书是作者的博士论文，写成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作者的行文当中不免保留有共和国建立以来由现实政治所赋予学界的教条主义流毒的影响，囿于“马克思”式的封建分期，在“黑白两分”的“先验”标准下，得出的“皇权在历史展开的过程不断加强”的论断。受如此限制，使得作者的论述过程，存在着前后逻辑的不通顺之处。但提出这些并不意味着苛责作者，作者只不过是未能跳出一个时代的普遍条件而已。

整体上作者的研究，即对宋代的修史制度的研究，完成度是上乘的，虽无何高论，亦足以达到最基本的要求，可资读者有所借鉴。作者在本书中下的判断，皇权在宋代较之前朝的加强，从细节上考量是不能成立的，不然，何来“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一语。这当然不是作者一人的见识，而是一“官方”的说法。但也不能只凭“共治”现象，就断言皇权在所有的领域都收缩了。确实，在一些方面皇权的发展是符合官方的一般判断的，如宋代皇帝对起居注的直接干预成为惯例。具体的事实究竟如何，皇权的变化究竟在宋代及以后以怎样的趋势展开，还需要更进一步的严谨的研究。

宋代史学在唐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其成就在古代中国空前绝后，构成了陈寅恪所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之一隅。宋代史学的这种孤峰独立，可为天水一朝在中国历史上之特殊性一证。后来之中国文明何以陷入停滞，文化何以不振，从史学在宋亡以降的变化，也可做管中窥豹。